

社會學習理論的實證：回顧與前瞻

DOI : 10.6905/JC.202507_14(2).0002

The Empirical Basi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Review and Prospects

林佳亨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

DOI : 10.6905/JC.202507_14(2).0002

摘要

林佳亨

Ronald L. Akers 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與緊張理論、控制理論並列為犯罪學三大理論，發展至今已逾 50 年，對本土犯罪學研究、矯正與觀護實務影響深遠。本文首先回顧 Akers 構建社會學習理論的時代背景，並整理其核心概念，包括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與模仿等，接著參照 Akers 及其研究團隊進行的實證研究，如 The Boys Town Study、The Iowa Study 和 The Florida Study，再觀照近代及當代圍繞社會學習理論及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Learning（SSSL）模型的相關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支持社會學習理論在當代偏差行為介入與犯罪防治領域中的應用價值，包含青少年物質使用、青少年偏差行為、成人暴力、成人親密關係暴力、青少年網路偏差行為和社會結構變遷等。社會學習理論在巨觀視角下關注社會結構的影響，也重視微觀層面的個人偏差行為，將持續啟發觀護、輔導實務、政策制訂和學術研究。

關鍵字 | 社會學習理論、偏差行為、社會結構、差別接觸

The Empirical Basi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Review and Prospects

Abstract

Lin Chia-heng

Ronald L. Aker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longside Strain Theory and Control Theory,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Developed over 50 years ago,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udy of criminology, as well as on correctional and probation practices in Taiwan. This paper begins by revisi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Akers formulated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outlines its core concepts, including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definitions, and imitation. It then examin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by Akers, such as the Boys Town Study, the Iowa Study, and the Florida Study, while also considering more recent research on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Learning (SSSL) model. The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undersc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in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 for deviant behaviors and crime prevention,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juvenile delinquency, adult sexual viol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dolescent cyber-deviance, an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By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ructur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while also emphasizing individual deviant behaviors at the micro level, Social Learning Theory continues to inspire advancements in probation, counseling practices, policy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 Social Learning Theory, Delinquency, Soc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社會學習理論由 Ronald L. Akers 發想、著述，至今已屆 50 年，與控制理論、緊張理論並為犯罪學三大重要理論，為本土犯罪學、矯正與觀護實務研究所重（楊士隆、任全鈞，1997）。社會學習理論就其四大核心要素之外，Akers 於 90 年代亦提出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Learning (SSSL) 模型，試圖更周延地解釋巨觀社會結構影響下，微觀個人因素影響犯罪形成的脈絡。本文將透過回顧社會學習理論興起的脈絡、內涵、過往與近年的實證，再探社會學習理論於本土犯罪學與矯正觀護實務中可深入研討之處。

壹、社會學習理論興起的脈絡

Ronald L. Akers 的求學時期，從大學到博士班，正值犯罪學理論百花齊放的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期間包括 Sutherland 提出的差別接觸理論、Cohen、Cloward 與 Ohlin 的副文化理論、Nye 和 Reckless 的控制理論，以及 Chambliss 的衝突理論相繼問世。Akers 在博士班研究初期專注於白領犯罪與法律社會學領域，直到博士後階段，與 Robert Burgess、Richard Emerson 等行為科學家合作。在行為科學、犯罪學和符號互動論的論述^[1]中，他發現 Sutherland 的差別接觸理論具有潛力，能夠作為連結個人與環境互動並進而影響偏差行為的理論橋樑 (Akers, 2017)。Akers 與 Burgess 共同撰寫並發表了整合差別接觸理論與行為強化觀點的差別接觸—強化理論 (Burgess & Akers, 1966)，得到 Sutherland 學生 Cressey 的支持，DeFleur 和 Quinney 也認為差別強化的觀念可以拓展差別接觸理論的內涵。其後，Akers 於 1968 年以物質使用為探討社會行為定義的主題，發表了相關期刊論文 (Akers, 1968)，奠定了社會學習理論的基本模型。翌年，他成功獲得相關研究經費，正式展開社會學習理論的實證研究。在研究過程中，Akers 曾與 Travis Hirschi 共事，並頻繁交流彼此對犯罪原因的看法。Akers 對 Hirschi 的實證研究深感啟發，但兩人

[1] 根據 Herbert Blumer 在 1969 年的著作《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符號互動論的核心概念包含：(1) 人依據客體 (object) 對自己的意義而行動；(2) 互動發生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人依照物理客體、社會客體 (人)、情境對自己的意義進行定義和分類；(3) 意義源自人與他人、社會的互動；(4) 意義在人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經過詮釋，不斷被創造與再創造。Akers 透過和 Burgess 的合作更深入探討 Skinner 的操作制約 (operant conditioning) 理論，Akers 認同 Skinner 將行為歸因於環境影響的觀點，但 Akers 認為 Skinner 動物實驗模型的「環境」因子過於人為，不適合社會學理論探討。Akers 認為符號互動論的觀點融合 Sutherland 差別接觸理論中對初級團體互動的重視，將有助於發展更能解釋個人與環境互動形塑 (shaping) 行為的理論 (Akers, 2017)。

在某些關於社會學習理論和社會鍵理論的基本定義上始終持有不相容的觀點 (Akers, 2017)。

貳、社會學習理論基本主張與內涵

Akers 的社會學習理論假設，在社會結構、互動、情境相同的學習過程中，個人會產生順從行為和偏差行為。個人會透過各種機制學習順從行為和偏差行為，主要機制包含差別增強中的獎懲、模仿中的觀察，這些機制與個人的外在行為有關，同時影響對行為的定義 (Akers, 2017)。

社會學習理論關注的四大核心概念包含：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與模仿。當這四個變量綜合的效應傾向促進、強化違規行為、而非順從行為時，犯罪與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會增加。這些因子作用可能趨向某種平衡，但也可能因時間或情境而改變。比如，當個人與懷有利於犯罪之定義的行為人進行差別接觸，接觸更多犯罪或偏差行為，個人定義這些行為獲取的獎勵高過可能受到的懲罰，定義這些行為可取、合理，則個人未來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會增加，順從行為的可能性會下降。

社會學習理論的四個核心概念建構而需驗證的假設包含：

表 1 社會學習理論四大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意涵
差別接觸	個人與其他從事、模仿並支持偏差行為的人建立差別接觸
差別強化	偏差行為比順從行為獲得更多獎勵／增強
定義	個人所學得的定義有利偏差行為進行

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偏差行為和順從行為的學習機制包含習得、執行、重複、維持、改變，個人會往維持還是改變的方向，需要考慮個人感知的獎勵、懲罰的質與量，以及可能性，同時也需要確認個人可以覺知的外部刺激和內在認知，包括語言、表情，這些可能構成一部分的條件反射、提示，這些概念也與個人對行為的正負向態度、信念、價值觀、行為理由有關。

個人與群體的接觸也需要考慮直接、間接、言語或非言語的互動，在互動中也包含接觸的頻率、強度、持續時間、優先性，因此分析個體接觸時，會考慮初級群體、次級群體、參考群體，這些群體不僅包含同儕，家庭成員與個人的早期接觸也相當重要，這些接觸可能先影響個體的順從或偏差行為，進而影響發展過程中同儕關係的選定 (Akers, 2017)。

據此，個體的學習歷程可從行為初始、行為持續、行為強化與頻率變化、定義調整、行為發展或停止的框架進行分析。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學習理論不認為偏差行為定義絕對先於偏差行為，模仿和增強也可能導致偏差行為。看到別人行為帶來的後果也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決定。做出某行為後，當事人可能用中立化定義辯解，而當事人面對的獎懲則會令當事人決定日後是否要繼續從事那樣的行為——這個過程摻雜了行為形塑和個人認知等要素，Akers 認為社會學習理論這部分的論述採納了 Bandura 的觀點 (Bandura & Walters, 1963)。

根據上述，社會學習理論可以探討行為習得的過程和表現、促進或抑制行為的因子、行為學習的成敗、行為的起始、重複、持續和終止。透過回顧各種偏差行為預測研究，Akers 認為，社會學習理論的實證研究著力點包含五大層面：1. 早年行為問題、反社會或偏差行為，比如生涯早期開始飲酒、吸毒、被逮捕、參與偏差行為，童年階段開始常說謊、偷竊、惹麻煩、有攻擊行為、逃學、衝動、過動表現；2. 偏差同儕接觸，包含接近有偏差行為的朋友或同儕、與幫派同儕來往；3. 父母與家庭因子，包含缺乏利社會之家庭價值觀、家內成員有反社會行為、父母管教不力、家內多衝突和負向關係；4. 偏差態度與信念；5. 學校因子則以學業表現不佳為主 (Akers, 2017)。

參、社會學習理論的實證研究

社會學習理論提出後，Akers 與其研究團隊據此進行數個大型實證研究。

首先是 The Boys Town Study (Akers et al., 2013)。The Boys Town Study 是一個於 1970 年代中期，由 Akers 及其研究夥伴在美國中西部，主要在 Nebraska 和

Iowa，進行的自陳性量表調查研究，對象包含7至12年級的學生，共3065位學生被納入研究。這項研究探究的問題包含青少年物質使用、偏差行為、學習表現、親子和同儕關係、對物質的可近性、對物質使用及違法性的態度。

Akers 的研究團隊認為物質使用的進程包含初始 (initiation of use)、持續或停止使用 (continuation or cessation of use)、進展至頻繁且大量使用或濫用 (progression into greater frequency, quantity of use and abuse)。

青少年從初始接觸物質到使用物質可能受到下列因素影響：有較多機會暴觸有物質使用者的環境、有較多機會與使用物質的同儕來往、物質使用過程的強化效應多過未使用物質的時候、採取正面或中立化用詞描述物質使用行為。從使用物質到頻繁且大量使用物質的過程可能受下列因素影響：暴觸大量使用物質的族群、從大量使用物質的過程中得到比過往更多的強化、持續採取中立化態度面對物質使用問題、物質使用獲取的正回饋不斷增強。

The Boys Town Study 在7所學校進行研究，每所學校抽樣2至3個班級，最終回收有效問卷為3065份。問卷填寫中有約106位學生具名填寫，這106位學生在2-8週後被研究團隊再次聯繫，進行面談，並再次填寫問卷，確認研究問卷具備良好的再測信度和內部一致性。

研究問卷中聚焦的物質包含酒、大麻、興奮劑、抑制劑、麻醉藥和其他強效毒品。關於模仿 (imitation / modeling) 構面的題項主要是：有沒有看過哪位你敬仰的人使用物質？比如藝人、父母、家庭成員、同儕、家外成人。關於差別接觸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構面，問卷中會探詢個人對物質使用和規範的態度，比如：哪一位成人的意見對你來說很重要或很重視？哪一位同儕的意見對你來說很重要或很重視？你的信仰或教會教給你什麼？該研究進行過程，學校不贊同研究人員調查學生家長使用物質的情形，再加上中學生受同儕影響較多，因此該研究主要聚焦在學生同儕的物質使用情形，探索的題項包含：你的好朋友有多少人使用物質？你跟這些同儕接觸的頻率和時間長度為何？

就受測者對物質使用態度 (One's own definitions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to substance use) 的構面，主要是探詢受測者的中立化定義、循規蹈矩的定義、正向和負向行為的定義。中立化定義的題項包含：大人沒資格責備青少年吸毒或喝酒，因為他們自己吸毒或酗酒的問題更嚴重；他人沒必要責難吸毒的青少年，因為那沒有害到任何人；青少年不應該因為吸毒被責備，因為他們已經承受太多沒辦法阻卻的壓力。循規蹈矩定義的題項是：你是否贊同道德上人民應該守法？對於正向和負向行為定義的題項是：你對使用物質的態度為何？

差別強化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構面探索的題項包含來自與使用物質相關的警察正式嚇阻、父母的非正式嚇阻，可能因為使用物質在人際上獲得的好處或可能因此承受的處罰，可能因為使用物質而得到的其他正向回應、報償、感受，可能因為沒有使用物質而得到的讚賞等。朋友或父母對使用物質的反應 (Friends' or Parents' reactions to one's use) 這項構面探索的題項包含：朋友會不會因為使用物質和你變得更要好？還是因為你使用物質，朋友反過來評斷你、打小報告、排斥跟你做朋友？父母會不會鼓勵你使用物質，還是不同意你使用物質，還是因此罵你、打你、趕你出去、報警抓你？使用物質後對生活影響 (interference with other important activities) 的構面則是探詢使用物質後對個人生活某些重要活動的參與有多少影響。

有使用物質的學生會進一步回答問卷中關於使用物質的好處、壞處，比如使用物質後可能容易融入群體，使用後極度開心等；或者成績變差、身體變差、覺得使用物質後得到的開心對自己其實沒有好處。這些學生也會進一步回答使用物質後的效果、頻率以及使用物質後衍生的問題。

問卷中針對偏差行為蒐羅的題項包含翹課、逃家、偷竊、因物質使用而打架、被警方攔查或發生意外。問卷收集的社會地緣因子包含年紀、性別、居住地、宗教信仰、年級、學習表現等。

研究結果支持社會學習理論對青少年物質使用現象的假設。青少年對物質使用的定義有 40% 來自父母與同儕 (酒與大麻的 $R^2 = 0.40$)，青少年物質使用行為與其自身對物質使用行為的定義有關聯 (喝酒 $r = 0.54$ 、使用大麻 $r = 0.70$)。透過二元迴

歸模型分析，青少年喝酒和使用大麻與同儕接觸、同儕態度、個人對物質使用的正向和負向定義、使用物質後的好處或壞處有關。透過多元迴歸模型分析，這些題項可以解釋青少年喝酒和使用大麻皆超過 50% (酒 $R^2 = 0.54$ 、大麻 $R^2 = 0.68$)。從構面的層次來看，青少年對物質使用的定義、差別接觸、差別強化等構面與物質使用有關聯，其中差別接觸的解釋力最強 ($R^2 = 0.47$)，尤其是來自同儕的效應 ($r = 0.40$)；模仿這個構面關聯則較少 ($R^2 = 0.16$)。

Akers 等人認為 The Boys Town Study 所探索的項目中，有 10 項與社會鍵理論有關，該 10 個題項可以解釋 30% 的青少年大麻使用；有 3 項與緊張理論有關，可以解釋 3% 的青少年大麻使用。如果將三大重要理論的最重要因子挑選置入同一個模型，從 standardized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可知，社會學習理論因子最能解釋青少年大麻使用行為。Akers 等人認為 The Boys Town Study 是第一個檢驗社會學習理論的重要研究 (Akers, 2017)。

第二個與社會學習理論關聯的重要研究是 The Iowa Study。Akers 在這項研究中與許多學者合作 (Akers et al., 1983; Akers & Lee, 1996; Krohn et al., 1985; Spear & Akers, 1988)，再次檢驗社會學習理論各項構面與青少年抽菸行為的關聯。這是一個在 Iowa 社區所進行的縱貫性自陳性量表調查研究，主要以 7 到 12 年級的中學生為研究群體，每年收案約 2000 人，包含曾經回答過研究問題、未曾回答過研究問題的各級學生，共收案 5 年。

為了確認填寫問卷者答案的可信度，題項中的物質使用內容會跟醫療紀錄中的物質使用紀錄對照，偏差行為的內容會跟官方紀錄對照，抽菸行為與頻率的呈報也會跟唾液中的尼古丁殘餘化合物濃度對照。問卷題項都經過因素分析篩選，題項信度也經過檢驗。

在 Iowa Study 的問卷中，探詢模仿構面的題項是：就你所知，你身邊的人有誰抽菸？你會在誰面前抽菸？如果你開始抽菸，你可能會在誰面前抽？有誰曾經在你面前抽菸？就此得出家長和同儕對受測者模仿的影響程度。就差別接觸的構面所問的題項包含：你有多少朋友抽菸？這些朋友跟你相處的時間有多長？你多常跟他們相處？你跟他們有多要好？你身邊的人對抽菸抱持怎樣的態度？關於定義的構

面，相關題項包含探詢受測者對青少年抽菸的正面或負面態度還有中立化態度，比如抽很多年才會有健康問題、父母認可就沒關係、如果沒有養成習慣，抽菸也沒關係。關於差別強化的構面，問卷題項探索受測者父母、同儕、自身對青少年抽菸好壞處的看法，比如：抽菸後可能帶來什麼好處或壞處？生理上可能會有什麼好處，比如覺得冷靜、感到滿足、保持體重、可以享受、放鬆、刺激；生理上可能有什麼壞處，比如味覺變差、感覺不好、胃痛、覺得噁心、影響學校表現等。抽菸行為的測量包含一天抽幾根菸？過去一個月、一個禮拜、昨天、今天抽多少菸？對自己抽菸量的定義，是完全沒有、一點點、中、很多，或是已經戒掉。

Iowa Study 研究結果呼應 The Boys Town Study，研究題項可以解釋超過 50% 的青少年抽菸行為 ($R^2 = 0.54$)，四大構面中，模仿與青少年抽菸的相關性最弱 ($r = 0.20$)，定義、差別接觸、差別強化都與青少年抽菸顯有關聯，尤其是差別接觸。針對差別接觸的情形探究，父母與同儕都沒有抽菸的受測者有 99% 連抽菸都沒嘗試過，父母跟同儕都有抽菸的受測者則有 84% 嘗試過抽菸，有 44% 已經有抽菸習慣。

在 Iowa Study 的三年追蹤研究中，研究團隊試圖探索抽菸的起始與持續模型。起始模型納入的受測者在第一年跟第二年都沒有抽菸，第三年才開始抽菸。受測者第一年的模仿和差別接觸指標被視為對第三年的抽菸有間接影響，第二年的定義和差別強化指標和認為對第三年的抽菸有直接影響，經過相關性分析後，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指標對第三年的抽菸行為解釋力非常低 ($R^2 = 0.03$)。相對的，持續模型納入第一年就開始抽菸的受測者，第三年時會評估這些受測者是否持續抽菸。第一年與第二年納入的指標同起始模型，經過分析後，這些題項解釋力可達 41%。

Iowa Study 的五年追蹤研究中，研究團隊收集第一年的父母模仿、同儕／父母定義構面，第二年的父母差別強化、同儕差別強化、中立化定義，第三年的差別同儕接觸，透過相關性分析探索這些構面與第五年開始抽菸的關聯，整個模型的解釋力達 43%，其中第三年的差別接觸與第五年開始抽菸的相關係數為 0.60。

Akers 與其研究生 Gang Lee 接著就 Iowa Study 中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的抽菸行為、社會學習關聯變相等重新進行關聯分析，驗證抽菸行為的時序效應，也就是差別接觸→抽菸行為→差別接觸→抽菸行為這個假設的穩定性，結果顯示，學

生第一年的抽菸行為很可能持續到第五年，透過評估，這個行為具有一定的預測性和穩定性。

爲了驗證社會學習理論不只適用於青少年族群，The Florida Study 被用來驗證長者族群飲酒習慣與社會學習理論的關聯 (Akers et al., 1989; Akers, 2017; Greca et al., 1988)。這項家戶探訪研究共納入 1410 位長者，年齡皆爲 60 歲以上。

針對飲酒情形，研究團隊探詢長者的過去一年飲酒的頻率、過去一個月飲酒的頻率、過去一年每當喝酒時約喝多少酒，60 歲前和 60 歲後的飲酒樣態，飲酒對長者身體、心理、社交層面的影響。

社會地緣因子包含年紀、種族、性別、婚姻狀態、教育、收入、職業、教育水準等。社會學習理論相關因子沿用 The Boys Town Study 和 Iowa Study 的題項，唯獨模仿構面就不採用針對青少年族群的問句，因爲研究團隊認爲詢問長者過往父母的飲酒情形會有準確度的問題，而長者飲酒的議題跟父母、少時同儕的關聯可能也未必可以解釋當前的飲酒行為，因此將長者模仿同儕飲酒與當前飲酒同儕的差別接觸視爲相當接近的構面，不再特別列出來分析。差別接觸構面的題項除了差別同儕接觸，還包含配偶和其他親屬的飲酒情況、飲酒行為對社交互動的影響、對飲酒後生理效應的正負向態度、認爲飲酒帶來的好處壞處，比如：飲酒讓我感覺放鬆、讓我享受休閒活動、讓我感到滿足、讓我感到有活力、酒不好喝、讓我覺得有罪惡感、讓我覺得不舒服等。

樣本初步分析指出，62% 的受測者在過往一年有飲酒，超過兩成幾乎每天喝，約 10% 明顯飲酒過量。社會地緣因子對過往一年的飲酒狀況約有 30% 的解釋力。針對社會學習理論相關因子的分析則符合預期，除了對過度飲酒的一般性看法這個題項之外，其餘題項皆與長者飲酒行為有關聯，多元迴歸分析亦可見這些題項針對長者飲酒的解釋力超過 7 成，其中差別強化與差別接觸的解釋力將近 50%。從分析數據比較，研究團隊認爲，青少年飲酒受差別接觸、同儕反應影響較大，而長者飲酒受差別強化影響較多，暗示長者相對重於飲酒後帶來的預期生理效果。

Akers 及其研究團隊爲了拓展社會學習理論驗證的廣度，於 1990 年代初期針對性暴力犯罪作了另一研究 (Akers, 2017; Boeringer et al., 1991)。首先針對 282 位大

學生在教室內填寫的自陳性量表收集針對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模仿等自變項，依變項是受測者認為自己有多少程度已經準備好在未來實施性暴力犯罪，以及受測者是否曾經強暴或以非肢體暴力、恐嚇、脅迫的方式施行非合意性行為。

關於差別接觸的構面，受測者會被詢問周遭朋友是否有人曾經發生過非合意性行為，或是否會讓女生喝太多酒然後與其發生性行為。差別強化的構面則詢問受測者如果自己發生非合意性行為、讓女生喝太多酒然後與其發生性行為、過去一年跟很多女生發生性行為，同儕會有怎樣的反應？過程自己可能感受如何？關於對性暴力犯罪的定義，研究團隊則使用性暴力迷思量表 (Burt's scale of rape myth)(Burt, 1980) 的 11 個題項。基於這些受測者不一定有機會直接親臨性暴力犯罪現場，研究者會探詢受測者多常觀看跟脅迫或非合意性行為相關的影片或書刊。經過多元迴歸分析，全部題項針對有傾向施用暴力進行性行為的解釋力約 53%，針對非合意性行為的解釋力約 41%。

針對性暴力犯罪這項主題的另外一個研究則試圖驗證社會學習理論、社會鍵理論、自我控制理論、相對剝奪理論 (也就是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研究團隊將這個理論歸屬於 Agnew 一般化緊張理論觸及的範疇) 對性暴力犯罪的解釋力。這個橫斷面設計的自陳性量表研究在大學校園進行，納入 515 位學生，有效填答率 92.6%。由女學生填答的問卷被用來評估女學生受性暴力或受迫進行非合意性交的被害情形。參考女學生的被害情形與男學生自陳非合意性交的經驗比率來看，男學生填答問卷時並未低報自身的性暴力行為。

該研究用三個項目定義強暴，包含：當女性不想發生性交時會採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威脅使用暴力而與女性發生性交得逞；使用暴力與女性發生性交得逞，有 8.6% 的受測者表示會有強暴行為。非身體暴力的脅迫則定義為：曾經透過威脅結束交往關係脅迫女性發生性行為；透過謊言迫使女性與其發生性行為，有 55.7% 的受測者表示曾以此手段發生過性行為。自陳曾經透過藥物或酒精酩酊時發生非合意性交的男學生則有 23.7%。關於社會學習理論因子的差別強化、定義、模仿等構面的問題都與前一個性暴力研究相同。研究團隊另針對差別接觸的構面改良並使用其他題項：過

去一年有多少性生活活躍的朋友？這些朋友過去一年大約有多少性伴侶？有多少朋友在女性用藥或飲酒後與其發生性行為？有多少朋友曾脅迫女性發生性行為？

Akers 研究團隊在第二個性暴力犯罪的研究設計中，關於控制理論的構面則包含依附、承諾、參與、信念、自我控制。依附的題項包含好朋友的數量、朋友意見的重要性、與父母的親密程度、與家庭的緊密程度、家人意見的重要性。承諾的題項包含學業表現、學習目標、求職目標。參與的題項包含社交活動數量、社交時間、學習時間。信念的題項包含守法的重要性、守法的好處、尊重他人自主等。針對自我控制理論的題項則有三題，藉此確認受測者的自我控制程度，包含有沒有可能透過暴力對人還以顏色、有沒有可能透過暴力得到自己想要的、當自己被人欺騙時有沒有可能用暴力解決。

關於相對剝奪理論的構面則用五個題項探詢，包含性生活活躍程度？是否比其他男性更有機會與女性發生性行為？跟其他男性性生活活躍程度相比，自己感受如何？與朋友性生活活躍程度相比，自己感受如何？與自己預期的性生活活躍程度相比，自己感受如何？

性暴力犯罪的第二項研究結果仍支持社會學習理論觀點。社會學習理論全部題項可以解釋超過 20% 的非合意性交、強暴行為、酩酊狀態性交；可以解釋超過 50% 的強暴傾向。社會鍵理論、自我控制理論與相對剝奪理論的全部題項對非合意性交、強暴行為、酩酊狀態性交、強暴傾向的解釋力都不超過 10%。

其他在 70 至 80 年代發表的社會學習理論研究還有針對大學生作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分析，包含橫斷面與縱貫面設計的相關性分析 (Lanza-Kaduce & Klug, 1986)；長者對犯罪的被害恐懼也曾以不同的調查模式進行關聯因子的測量，各項研究顯示不一樣的結果，鄰里的犯罪情形與重要他人的被害經驗可能影響長者的被害恐懼，但在不同地區與性別族群間解釋力差別不小 (Akers et al., 1987; Ferraro & Grange, 1987; LaGrange et al., 1992)。

90年代開始，社會學習理論的驗證也拓展到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樣本。韓國學者針對居住在都市或工業區的10到11年級高中生抽菸、飲酒行為進行自陳性量表調查研究(Hwang & Akers, 2003)。結果顯示，與社會鍵理論、自我控制理論相比，社會學習理論的全部題項對韓國高中生抽菸、飲酒行為的解釋力明顯較佳，超過50%，其中同儕接觸尤為重要。

王淑女於90年代初期曾針對9所學校、共935位國二學生進行偏差行為自陳性調查(Wang & Jensen, 2003)。偏差行為包含打架、破壞公物、飲酒、逃學、賭博、抽菸、搶奪、恐嚇、逃家、使用毒品等，自變項包含學校／家庭結構因子、緊張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關聯因子，研究結果指出，與幫派朋友往來、對暴力行為的態度、憤怒或壓力是針對偏差行為解釋力較強的因子。

楊士隆與任全鈞(1997)以本土少年觀護所、少年監獄、少年輔育院接受徒刑與感化教育之少年吸毒犯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包含人口學因子、機會變項、社會學習理論變項等。553份有效問卷中，男性占73.9%，70.4%教育程度為國中，90%每月家庭收入小於7萬元，父母親受過高中職教育者小於20%。約7成毒品來源來自朋友。社會學習理論變項整體解釋力達21%，其中同儕接觸這個變項的解釋力最強($R^2 = 0.135$)，呼應Akers的The Boys Town Study和The Iowa Study的研究結果。

90年代中期，隨著發展犯罪學研究起興，亦有學者從過往成長經驗對家庭暴力的影響進行社會學習理論相關因子的探究(Capaldi & Clark, 1998; Pears & Capaldi, 2001)。

近20年，社會學習理論的研究面向更多元。郭慧敏(2005)指出，影響青少年不良行為最重要之社會學習理論因子是負增強，也就是，愈被處罰、愈可能從事偏差行為，直接影響這條路徑的因子包含投機心理、衝動人格、父母教育程度較低、家庭成員有偏差行為等。荷蘭地區研究受測者結果指出同儕偏差行為對自己偏差行為影響不大(Young et al., 2014)；Gang Resist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G.

R.E.A.T.) 系列研究則指出，犯罪傾向低的受測者容易受到偏差同儕影響而有偏差行為，然而若受測者對於偏差行為衍生的後果預期有罪惡感，則較不容易受到偏差同儕影響 (Thomas & Mccuddy, 2020)；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 (Add Health) 這個縱貫研究系列其中之一則指出，班級每增加5%有犯罪行為的同儕，則個人犯罪行為可能增加3%，該研究團隊認為許多針對犯罪少年族群的介入也應該多觀察介入後的外溢效果 (Kim & Fletcher, 2018)。橫跨北美、南美、亞洲的社會學習理論研究 (Tittle et al., 2012) 則指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社會學習理論仍有解釋力，過往犯罪行為衍生的差別強化對於偏差行為的預測有直接效果，對於犯罪行為的定義也有間接效果，研究團隊認為，差別強化可能也受到社會文化影響。

關於社會學習理論的另一個重要研究主題是親密關係暴力。Cochran 的研究團隊曾以結構方程檢驗社會學習理論四大構面與親密關係暴力的相關性 (Cochran et al., 2017)，卻僅有差別強化與行為人第一次、第二次的親密關係暴力有關，差別接觸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影響僅具有間接效果，而定義與模仿與親密關係暴力的相關性則相當低，Cochran 團隊難以解釋這個結果。然而他們卻發現，透過低自我控制題項指標定義的犯罪傾向 (criminal propensity) 可能對社會學習理論構面與親密關係暴力的關聯有調節作用 (Cochran et al., 2016)，這也讓 Cochran 團隊懷疑可能某些變量的題項設計不完善，又或者社會學習理論對某些類型的犯罪行為解釋仍有其限制。

Akers 在 90 年代後半提出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learning (SSSL) 模型 (如圖 1) 時，整合社會結構因子與社會學習理論因子，試圖從巨觀與微觀層次解釋犯罪行為的發生、持續和轉變，個體所處的社會背景特徵、社會位置、與特定群體的接觸、針對行為的強化、定義、模仿等，會影響個體及群體的犯罪率。Akers 曾指出這是一個在實證研究上不易驗證的整合理論，但 Akers 透過各種不同實證說明 SSSL 簡易模型仍可部分被驗證，包含社會結構對犯罪率的影響，社會心理因子對犯罪行為的影響等 (Akers,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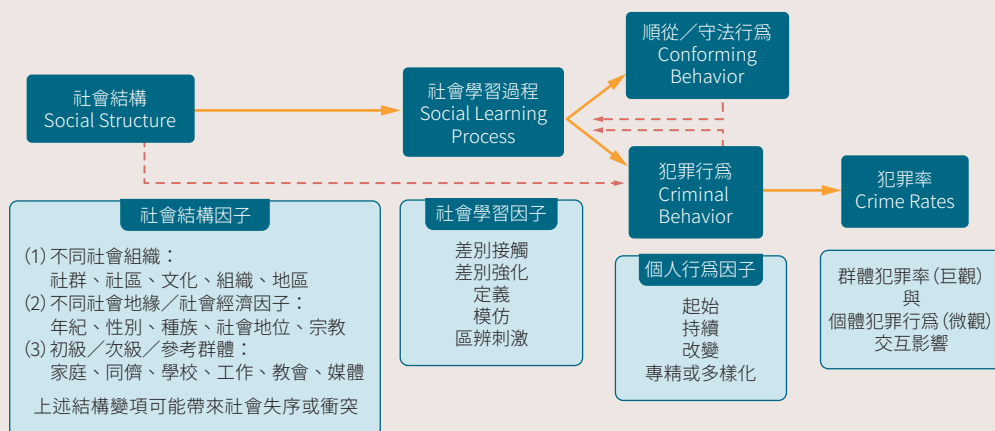


圖 1：Akers 提出的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learning (SSSL) 模型^[2]

Akers 的研究團隊用 The Boys Town Study 中青少年物質使用的調查數據，透過 SEM 檢驗社會結構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否受到社會學習理論的變量中介。納入的自變項包含性別、階級、年齡、家庭結構、社區規模、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模仿等。依變項是青少年的酒精和大麻使用。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模仿之外，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等社會學習變項對社會結構因素與物質使用的關係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Lee et al., 2004)。

針對社會結構其他更細緻的分析尚有針對非裔美國青少年樣本進行的 SEM 分析研究 (Simons & Burt, 2011)。該研究假設犯罪原因來自對別人和人際關係抱持敵視態度，且當事人偏好即時回饋、漠視傳統規範，研究假設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形成一種犯罪知識結構，致使當事人面對情境有不同解釋，合理化犯罪行為。研究結果指出，持續暴露於不利條件下，包含多社區犯罪、歧視、嚴厲教養方式、偏差同儕及社區集體效能低下等，會增加人際互動間敵視態度、增加偏好即時回饋和漠視傳統規範的傾向。該研究結果認為巨觀的環境因素與微觀層次的個人特質仍應有機會連結而成一整合理論。

[2] 參考 Akers 著作 (Akers, R. L. (2017).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29587>) 中關於 SSSL 模型的整合理論圖重新再製。

SSSL 模型近年也開始針對 Z 世代的網路世界偏差行為進行驗證。以 580 位大學生為研究樣本的網路偏差行為研究 (Holt et al., 2010)，透過 SEM 驗證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模仿等自變項與網路偏差行為的相關性，同時檢驗種族、性別對社會學習變項與網路偏差行為的調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研究中，自我控制與道德感對網路偏差行為產生的交互作用並不顯著。

為了探索 Z 世代差別接觸的變遷，荷蘭以 12-15 歲多元族群青少年為研究樣本 (Defoe et al., 2018)，共納入 602 位學生，約一半為女性，進行一年期追蹤，以 SEM 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對較年輕的青少年而言，較好的母子互動能削弱同儕壓力對偏差行為的影響，然而對年紀稍大的青少年族群而言，母子關係、性別對偏差行為沒有太大影響。經過控制，研究團隊仍可注意到過往偏差行為對未來偏差行為的預測性。

另一個針對在 Z 世代成長的大學生樣本 (Boman et al., 2019) 研究試圖透過朋友關係配對，探討自我控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如何解釋朋友間的犯罪專業化和多樣性。透過多層次、雙向、混合效應模型，在控制人口學變項後，探究犯罪多樣性與同儕多樣性、自我控制的關聯。結果顯示，同儕多樣性高、同儕犯罪多樣性高，自我控制不佳者，犯罪多樣性高。同儕的自我控制程度則與受測者的犯罪多樣性無關。

關於本節提到關於社會學習理論的所有研究，作者依照提及的順序，整理並摘要如下表：

表 2 社會學習理論的實證研究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Akers et al. 2013	The Boys Town Study 是 1970 年代收集的數據，探究青少年物質使用、偏差行為、學習表現、親子和同儕關係、對物質的可近性、對物質使用及違法性的態度	從構面的層次來看，青少年對物質使用的定義、差別接觸、差別強化與物質使用有關聯，差別接觸的解釋力最強 ($R^2 = 0.47$)。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Akers et al., 1983; Akers & Lee, 1996; Krohn et al., 1985; Spear & Akers, 1988	The Iowa Study 檢驗社會學習理論因子與青少年抽菸行為的關聯	模仿與青少年抽菸的相關性最弱，定義、差別接觸、差別強化都與青少年抽菸有關，尤其是差別接觸，其中差別接觸比抽菸行為先發生。
Akers et al., 1989; Akers, 2017; Greca et al., 1988	The Florida Study 檢驗社會學習理論因子與長者飲酒行為的關聯	差別強化與差別接觸的解釋力將近50%，長者飲酒受差別強化影響較多，長者可能著重飲酒後預期的生理效果。
Akers, 2017; Boeringer et al., 1991	研究大學生對性暴力犯罪的態度	社會學習理論全部因子可以解釋超過20%的非合意性交、強暴行為、酩酊狀態性交，也可以解釋超過50%的強暴傾向。
Lanza-Kaduce & Klug, 1986	針對大學生作弊行為進行社會學習理論相關性研究	低道德發展階段的學生作弊行為容易受到同儕影響；中道德發展階段的學生作弊行為容易受到內化定義影響；高道德發展程度的學生則沒有顯著關聯因子。
Akers et al., 1987; Ferraro & Grange, 1987; LaGrange et al., 1992	長者被害恐懼研究	鄰里的犯罪情形與重要他人的被害經驗可能影響長者的被害恐懼（差別接觸與差別強化）。
Hwang & Akers, 2003	韓國高中生抽菸行為研究	社會學習理論的全部題項對韓國高中生抽菸、飲酒行為的解釋力明顯較佳，超過50%，其中同儕接觸尤為重要
Wang & Jensen, 2003	國中生偏差行為自陳調查	與幫派朋友往來（差別接觸）、對暴力行為的態度（定義）針對偏差行為解釋力較強。
楊士隆、任全鈞，1997	針對少年吸毒犯之間卷調查研究	社會學習理論變項整體解釋力達21%，同儕接觸的解釋力最強。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Capaldi & Clark, 1998; Pears & Capaldi, 2001	過往成長經驗對家庭暴力的影響	早年受暴的負面家庭經驗（差別接觸）影響個體日後的家庭暴力行為。
郭慧敏，2005	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之社會學習理論因子研究	愈被處罰、愈可能從事偏差行為（負增強），直接影響這條路徑的因子包含投機心理、衝動人格、父母教育程度較低、家庭成員有偏差行為等。
Young et al., 2014	荷蘭學生偏差行為研究	受測者結果指出同儕偏差行為對自己偏差行為影響不大。
Thomas & Mccuddy, 2020	Gang Resist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G.R.E.A.T.) 系列研究	犯罪傾向低的受測者容易受到偏差同儕影響而有偏差行為，然而若受測者對於偏差行為衍生的後果預期有罪惡感，則較不容易受到偏差同儕影響。
Kim & Fletcher, 2018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 (Add Health)	班級每增加5% 有犯罪行為的同儕，則個人犯罪行為可能增加3%(差別接觸)。
Tittle et al., 2012	跨文化成人偏差行為社會學習理論因子研究	不同文化背景下，社會學習理論仍有解釋力，過往犯罪行為衍生的差別強化對於偏差行為的預測有直接效果，對利於犯罪的定義也有間接效果。
Cochran et al., 2017	社會學習理論與親密關係暴力的相關性	差別強化與親密關係暴力有關，差別接觸對親密關係暴力僅具間接效果，而定義與模仿與親密關係暴力的相關性相當低。
Lee et al., 2004	沿用 The Boys Town Study 數據進行結構方程式檢驗	除了模仿之外，差別接觸、差別強化、定義等社會學習變項對社會結構因素與物質使用的關係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Simons & Burt, 2011	非裔美國青少年偏差行為社會學習理論因子研究	社區犯罪、歧視、嚴厲教養方式(環境)、偏差同儕(差別接觸)及社區集體效能低下(環境)會增加人際互動間敵視態度、增加偏好即時回饋和漠視傳統規範的傾向，個人特質仍可能受環境影響。
Holt et al., 2010	大學生網路偏差行為研究	種族、性別與網路偏差行為的關聯受到社會學習理論因子中介效果影響。
Defoe et al., 2018	荷蘭青少年偏差行為研究	較好的母子互動削弱同儕壓力(差別接觸)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對年紀稍大的青少年族群而言，母子關係、性別對偏差行為沒有影響。
Boman et al., 2019	大學生偏差行為研究	同儕多樣性高、同儕犯罪多樣性高(差別接觸)，自我控制不佳者，犯罪多樣性高。同儕的自我控制程度則與受測者的犯罪多樣性無關。

肆、實務與研究意涵

社會學習理論提出至今已有 50 年，經過東西方不同研究團隊在不同年代驗證，社會學習理論對於物質使用、少年偏差行為、性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同儕接觸、網路偏差行為、初級群體互動的行為影響和其他不同行為社會學主題等，皆有其實證。我們從這些研究的方法學和研究成果獲知，青少年物質使用問題、偏差行為受差別同儕接觸影響顯著 (Akers et al., 2013；Lee et al., 2004)；長者飲酒行為 (Akers et al., 1989; Akers, 2017; Greca et al., 1988) 和年輕成人親密關係暴力或性暴力行為受差別強化影響顯著 (Akers, 2017; Boeringer et al., 1991)；對於年紀較輕的學生而言，良好家庭互動可削弱不良同儕互動的影響；對年紀較長的學生而言，同儕互動的影響明顯較多 (Defoe et al., 2018)。網路偏差行為 (Holt et al., 2010)、詐欺犯罪 (黃光甫，2023) 等當代重要犯罪類型動機於行為模式的建構分析中，社會學習理論的差別強

化亦有其角色。當社會學習理論對犯罪類型或偏差行為的預測性有限時，便需要考慮社會結構、自我控制、個體緊張等巨觀和微觀觀點對偏差行為的交互作用。

Akers 和 Jensen (2003) 認為，在政策制定與實務運作成果的研究架構中，再犯是一個常見的依變項，然而將再犯當成依變項的研究設計並不適合用來驗證理論的適用性。從 Akers 過往的研究足跡和認定隸屬社會學習理論的實證研究來看，至少須包含有社會學習理論四大核心概念的因子做為自變項，針對這些自變項的測量方法將影響研究結果。同時，進行社會學習理論研究時需要留意研究的行為類型、犯罪類型、年齡和社會結構等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影響研究變項的實際操作，比如年長者的偏差行為可能不能透過早年父母或同班同學的偏差行為作為差別接觸構面的問卷題項。Akers 認為社會學習理論的四個核心概念加總的效果會決定個體從事順從行為和偏差行為的傾向，因此某些研究認為同儕接觸對行為的關聯性不明顯，不代表該行為不能用社會學習理論解釋，除了考慮總體變項的解釋力之外，同時也要考慮各項構面的測量方式，或是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對第一線進行兒童青少年犯罪防治或保護管束工作的專業人員而言，許多政策著重對兒童個人的輔導，對少年個人的管束。然而若從社會學習理論的行為初始、重複與持續之觀點切入，對兒少初級群體影響力的掌握可能更重要，除了前線專業人員各自的努力之外，或許更具體的作為可以考慮：1. 學齡兒童的偏差行為輔導需要確認父母或照顧者與兒童的互動關係和教養模式，據此進行介入；2. 中學少年需要確認其校內、校外同儕互動情形，可從物質使用、網路使用、性經驗、偏差行為、犯罪行為等不同層次的問題探詢，逐步建立關係後，也可關注個人介入後對群體的影響力；3. 網路偏差行為和少年／年輕成人參與詐欺犯罪的治理倘若以加重刑罰、增加取締或宣導為主，可能影響的社會學習理論因子是「定義」和「差別強化」，然而目前仍需要更具體的政策針對網路詐欺之犯罪腳本背後的差別接觸進行分析與擊破，如社群媒體和常用交友軟體中的關鍵字，儘管問題導向警政作為已經鎖定某些特定符碼進行監控與偵查，然而針對某些特定資訊在網域的交流是否能進一步管制，實需要法源依據方能研擬應對政策，同時也需要矯正與觀護專業或相關研究人員蒐羅更多質性的資料以理解這些術語形成的社會結構與擴散脈絡。

伍、結論

對監所管理員、觀護人、學校輔導老師等進行矯正、保護管束、犯罪預防的前線人員而言，許多表單或紀錄都有呈現家庭關係、同儕互動的題項，這些題項除了來自再犯預測的實證研究外，對於行為學習的建構、持續亦相當重要，在實務工作中，通常不容易直接改變當事人的認知、價值觀，對事情的定義，也無法改變過往的經驗，但職業訓練、學習活動、休閒生活的安排，目的往往就是為了改變偏差或犯罪行為人的生活樣態與接觸的次級群體，對前線專業人員而言，如有機會協助行為人調整其自身與初級群體的關係，可能便是調整差別接觸與差別強化因子的開始，這些工作儘管吃力，然而在理論與實證的支持下，我們仍有許多開展研究方向與實務策略的空間。

陸、參考資料

一、中文文獻

- 郭慧敏(2005)。從家庭結構、社會控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探討青少年不良行為(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zc46gq>
- 楊士隆、任全鈞(1997)。一般性犯罪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之實證檢驗：以犯罪矯正機構吸毒少年為例。犯罪學期刊, 3(3), 59-83。<https://doi.org/10.29607/ZHWHGX.199712.0004>
- 黃光甫(2023)。跨境詐欺犯罪的脈絡與歷程—犯罪成因、網絡與生活型態之分析(博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f86q3j>

二、英文文獻

- Akers, R. L., LaGreca, A. J., Sellers, C., & Cochran, J. (1987). Fear of crime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Criminology*, 25(3), 487-506.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1987.tb00807.x>
- Akers, R. L., & Jensen, G. F. (2003).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A guide for the new century*. Transaction.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y0CkMQEACAAJ>
- Akers, R. L. (1968).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Social definitions and behavior. *Social Forces*, 46(4), 455-465. <https://doi.org/10.2307/2575380>

- Akers, R. L. (2017).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29587>
- Akers, R. L., LaGreca, A. J., Cochran, J., & Sellers, C. (1989).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alcohol behavior among the elderl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0(4), 625–638. <https://doi.org/10.1111/j.1533-8525.1989.tb01539.x>
- Akers, R. L., & Lee, G. (1996).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dolescent smoking. *Journal of Drug Issues*, 26(2), 317–343. <https://doi.org/10.1177/002204269602600203>
- Akers, R. L., Massey, J., Clarke, W., & Lauer, R. M. (1983). Are self-reports of adolescent deviance valid? Biochemical measures, randomized response, and the bogus pipeline in smoking behavior. *Social Forces*, 62(1), 234–251. <https://doi.org/10.2307/2578357>
- Akers, R. L., Radosevich, M., Lanza-Kaduce, L., & Krohn, M. (2013). Boys Town Study of Youth Development.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utor]. <https://doi.org/10.3886/ICPSR34595.v1>
- Bandura, A., & Walters, R. H. (1963). *Social learning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Boeringer, S. B., Shehan, C. L., & Akers, R. L. (1991). Social contexts and social learning in sexual coercion and aggressio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fraternity membership. *Family Relations*, 40(1), 58–64. <https://doi.org/10.2307/585659>
- Boman, J. H., 4th, Mowen, T. J., & Higgins, G. E. (2019). Social learning, self-control, and offending specialization and versatility among friends.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4(1), 3–22. <https://doi.org/10.1007/s12103-018-9445-7>
- Burgess, R. L., & Akers, R. L. (1966). A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reinforcement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14(2), 128–147. <https://doi.org/10.1525/sp.1966.14.2.03a00020>
- Burt, M. R. (1980). Cultural myths and supports for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2), 217–23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8.2.217>
- Capaldi, D. M., & Clark, S. (1998). Prospective family predictors of aggression toward female partners for at-risk young m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6), 1175–1188.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4.6.1175>
- Cochran, J. K., Jones, S., Jones, A. M., & Sellers, C. S. (2016). Does criminal propensity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variables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eviant Behavior*, 37(9), 965–976. <https://doi.org/10.1080/01639625.2015.1060793>

- Cochran, J. K., Maskaly, J., Jones, S., & Sellers, C. S. (2017).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s to model Aker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with data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rime & Delinquency*, 63(1), 39–60.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15597694>
- Defoe, I. N., Dubas, J. S., & van Aken, M. A. G. (2018). The relative roles of peer and parent predictors in minor adolescent delinquency: Exploring gender and adolescent phase differenc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18.00242>
- Ferraro, K. F., & Grange, R. L. (1987). The measurement of fear of crime. *Sociological Inquiry*, 57(1), 70–97.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2X.1987.tb01181.x>
- Holt, T. J., Burruss, G. W., & Bossler, A. M. (2010). Social learning and cyber-deviance: Examining the importance of a full social learning model in the virtual world.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33(2), 31–61. <https://doi.org/10.1080/0735648X.2010.9721287>
- Hwang, S., & Akers, R. L. (2003).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in South Korea: A cross-cultural test of three theories. I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A guide for the new century* (pp. 39–64).
- Kim, J., & Fletcher, J. M. (2018). The influence of classmates on adolescent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viant Behavior*, 39(3), 275–292. <https://doi.org/10.1080/01639625.2016.1269563>
- Krohn, M. D., Skinner, W. F., Massey, J. L., & Akers, R. L. (1985).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adolescent cigarette smok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Problems*, 32(5), 455–473. <https://doi.org/10.1525/sp.1985.32.5.03a00050>
- LaGreca, A. J., Akers, R. L., & Dwyer, J. W. (1988). Life events and alcohol behavior among older adults. *The Gerontologist*, 28(4), 552–558. <https://doi.org/10.1093/geront/28.4.552>
- LaGrange, R. L., Ferraro, K. F., & Supancic, M. (1992). Perceived risk and fear of crime: Role of social and physical inciviliti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9(3), 311–334. <https://doi.org/10.1177/0022427892029003004>
- Lanza-Kaduce, L., & Klug, M. (1986). Learning to cheat: The interaction of moral-development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ies. *Deviant Behavior*, 7(3), 243–259. <https://doi.org/10.1080/01639625.1986.9967710>
- Lee, G., Akers, R., & Borg, M. (2004). Social learning and structural factors i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5.

- Pears, K. C., & Capaldi, D. M. (200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buse: A two-generational prospective study of an at-risk sample. *Child Abuse & Neglect*, 25(11), 1439–1461. [https://doi.org/10.1016/S0145-2134\(01\)00286-1](https://doi.org/10.1016/S0145-2134(01)00286-1)
- Simons, R. L., & Burt, C. H. (2011). Learning to be bad: Adverse social conditions, social schemas, and crime. *Criminolog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49(2), 553–598.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2011.00231.x>
- Spear, S. F., & Akers, R. L. (1988). Social learning variables and the risk of habitual smoking among adolescents: The Muscatin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4(6), 336–342.
- Thomas, K. J., & McCuddy, T. (2020). Affinity, affiliation, and guilt: Examining between- and within-person variability in delinquent peer influence. *Justice Quarterly*, 37(4), 715–738. <https://doi.org/10.1080/07418825.2019.1634752>
- Tittle, C. R., Antonaccio, O., & Botchkovar, E. (2012). Social learning, reinforcement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three European cities. *Social Forces*, 90(3), 863–890. <https://doi.org/10.1093/sf/sor020>
- Wang, S.-N., & Jensen, G. F. (2003). Explaining delinquency in Taiwan: A test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I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pp. 65–83).
- Young, J. T. N., Rebellon, C. J., Barnes, J. C., & Weerman, F. M. (2014).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peer similarity in devianc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linking personal behavior, peer behavior, and perceptions. *Criminology*, 52(1), 60–86. <https://doi.org/10.1111/1745-9125.12029>

MEMO LIST
